

霍四通
著

中国近现代修辞学
要籍选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修辞学要籍选编/霍四通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444-9077-1

I. ①中… II. ①霍… III. ①汉语-修辞学-文献-
汇编-中国-近现代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01500 号



责任编辑 徐川山
封面设计 陆弦

中国近现代修辞学要籍选编 霍四通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4.25 插页 4
字 数 38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9077-1/H·0314
定 价 12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一、整理和出版近现代修辞学文献的迫切性^①

西方学界在修辞学史的研究和修辞学文献的整理这两方面一直是齐头并进的,在修辞学史研究繁荣的同时,修辞学经典著作的重印本、经典文献的精读本也不断出版发行。^②

而国内学界在这两方面发展并不平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为滥觞,中国修辞学史研究领域先后有大批著作出版,对修辞学研究作了及时的阶段性总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但和这些理论总结不相匹配的是,对经典修辞学著作的整理和出版却严重滞后。郑奠、谭全基编《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主要为“我国传统的修辞学和修辞学史的工作提供比较集中的资料”,但遗憾的是并无后继者对清末及民国时期的近现代修辞学著作加以整理。

这一时期的很多修辞学论著,由于各种原因,学界普遍反映比较罕见。如北大学者陆胤在《清末西洋修辞学的引进与近代文章学的翻新》一文中就提到

^① “近现代”的历史分期一直存在很多分歧,和“近代”“现代”“清末民初”等名称有较多的纠葛。我们用其指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五十年(1900—1949),内涵上大致等同于“清末、民国时期”。本书主要集中于1904—1931年间修辞学文献(根据修辞学史的一般分段方法,以《修辞学发凡》出版为界,先期整理这一时间点以前的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这一时间段和“清末民初”(1840—1928,即从鸦片战争到北伐战争)比较接近,但还略有出入。所以仍采用“近现代”的名称。

^② 顾曰国教授就曾在提到促使他走上语言学道路的启蒙著作时说:“我开始认真读语言学著作,是1981年。第一本中文著作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第一本英文语言学著作是J. Corbett的 *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这两个‘第一’让我终生难忘。”(《顾曰国语言学海外自选集》“自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后一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编入了大量的古典修辞学阅读材料。

了修辞学资料搜求的不易：“……《修词学教科书》存世极少，国内各大图书馆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教科书藏馆均未收藏，目前笔者仅能通过私人藏家看到该书《叙言》《目录》版权页及部分内文。”（《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确实，1949年以后，清末民国时期的修辞学著作罕有重新出版的。二十世纪的大型“民国丛书”也只影印了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王易《修辞学通论》和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三种（第二编57），版本也颇不佳。近年开发的一些民国文献数据库，也都只零星收入一些修辞学论著，读者使用也很不方便。大部分重要的现代修辞学文献查找起来仍然困难重重。可见，对近现代的修辞学文献加以全面的整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商务印书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推出了“汉语语法丛书”，收入了《马氏文通》《中国文法要略》等十本经典语法著作，这对于语法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相比较而言，经典修辞学论著目前流通的只有一本《修辞学发凡》，而且是1949年后的修订本。清末民国时期的其他一些修辞学经典著作都很少被阅读和引用。这对于继承现代修辞学的遗产，促进当代修辞学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本书内容和形式设计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们历时十余年，在前贤修辞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搜集、整理大量的近现代（主要是清末民初时期）修辞学文献，经过精挑细选、系统的纂辑和整理而形成的。每一种文献都经过抄写或拍照、录入、标点、校勘、编目的流程，然后结合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阅读水平，添加注释和撰写导读，力求用现代的学术话语，对这些历史文献作出客观的叙述、解读和评价，以方便当代读者阅读和利用。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进行这样的“深度加工”？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在形式上，如果只是简单地影印出来，方便是方便了，也不会出错，但对今天的读者可能帮助并不大。因为阅读习惯毕竟改变了，竖排左行、略施圈点可能会降低大部分读者的阅读效率，加上是繁体的图片格式，很难通过信息检索进入各种知识资源而被读者方便利用。此外，古籍字大行稀，一页没多少字，影印也会增加读者的经济负担。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内容方面，因为时代久远，今天的普通读者阅读这些文献已经存在不少的文字障碍。例如汤振常《修词学教科书》：“康及黎安曰，文章者，不必作（可理解者）而不能不作（不可理解

者)。可谓至言。”“倍罗有言曰：‘进乎！余辈他日愿为文坛上之大文豪乎？决不可以平庸之作家自画。’”（第一章概论）其中，“康及黎安”“倍罗”所指何人，语出何书，都需要加以解释，不然会直接影响到对文意的理解。因此，仅仅限于资料的简单整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注释和说明。

在此基础上，对于每种文献我们都分别具体考察其在学术上的传承，在学术史的高度综合判断其价值。例如，龙伯纯《文字发凡》在“积极的想彩”所列诸法，除了譬喻法、化成法、布置法和表出法之外，还有不少来自中国古代诗话、文论、评点中的“法”（有起法、提纲法、体物法、进退法、离合相生法、关锁法、分总法、跌宕法、顿住法、反正法、往复法、先后法、引用法、禽纵法、映写法、防遁法、画龙点睛法、翻振法、敲击法、扑拍法、烘托法、常山蛇势法、展拓法、百尺竿头进一步法、顶针回环法、前断后解法、无中生有法、架空法、斜插法、几叠法、急脉缓受法、缓脉急受法、换头法、撇开法、收束法、入题还题法、斡旋法、对面冷刺法、波澜法、转换法、激绪法、结尾法等），表面看都直接来自日本的著述，但其实都间接来自中国唐彪《读书作文谱》、包世臣《艺舟双楫》的《文谱》等著作。弄清这些源流对于我们理解这些著作是有帮助的。

在选编的过程中，我们重视原始材料的查阅，加强校勘，以减少文字的讹讹。由于时局动荡，清末民国时期的不少书籍由于出版仓促，加上编印者水平参差不齐，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文字错误。如唐钺的《修辞格》的不少用例就有明显错误，如“予临兆民，怀乎若朽索之馭六马”（《书·五子之歌》），“怀”当为“慄”。对这些用例，都需要参照今天古籍整理的成果进行对校。

清末民国时期的修辞学文献数量庞大，我们暂时还无力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因此拟择其最精当者加以整理。主要包括：

1. 《演说修辞法》（晋报馆，1903年）。新见资料，笔者确认这是目前国内最早出版的修辞学著作。
2. 《修词学教科书》（南洋中学堂，1905年）。
3. 《文字发凡》第三、四卷（广智书局，1905年）。当前学界认为第2、第3两种是国内最早出版的修辞学著作。
4. 唐钺《修辞格》（商务印书馆，1923年）。目前学界公认的在《修辞学发凡》之前最好的修辞学著述。
5. 陈望道《修辞学》（节选前十一节。《修辞学发凡》油印本，1923年到

1930年间多版,本书采用《修辞学发凡》1932年初版前的最后一版,即1930年版)。

6. 胡怀琛《修辞的方法》(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6月)。

7. 修辞学论文三篇(外一篇),即陆殿扬的《修辞学与语体文》(《东方杂志》第17卷第12号,1920年;另附同作者的一篇《语体文与修词学》以作参照,载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第三编,上海中国书局1921年版)和云六《国语修辞法述概》(《教育杂志》第13卷第12期,1921年),这两篇在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中都被提到过;何爵三《中国修辞学上的几个根本问题》(《努力学报》创刊号,1929年9月)。这几篇文章可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修辞学领域的“代表性”论文。

我们之所以先选择这些文献辑成一册,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它们可称得上是清末民国时期现代修辞学经典文献中最核心的部分,作者学风都不失严谨,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今天的修辞学研究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其次,这些文献都有一定的珍稀性(特别是第1—3种和第5种,都是经过多年多方搜求才得经眼),因此需要把它们尽快整理出来以飨广大读者。第三,这些文献都是在1932年以前出版、发表的。我们以1932年为界,先辑录在《修辞学发凡》正式出版之前出版或发表的文献,以帮助大家了解在《修辞学发凡》之前中国修辞学研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及修辞学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从第5种《修辞学发凡》的油印本来看,陈望道先生早期的学术观点和后来也有很多不同)。另外,除了何爵三的论文^①外,其他文献均在上海发表。我们由此也可以了解《修辞学发凡》这样的经典为什么能够在上海孕育、诞生,因为上海具有修辞学学术研究的浓厚氛围。最后,这些文献篇幅都比较短小,都谈不上是什么鸿篇巨制(第5种《修辞学发凡》的油印本出于藏家权益及版权保护的考虑只节录了前十一节)。这一方面是当时学术著作的常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本项整理研究是在没有得到任何项目支持的条件下,完全凭个人一己之力开展的,每种文献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入电脑的,所以我们也是有意回避了那些卷帙稍繁一些的著作。我们对张弓、董鲁安、龚自知、陈介白等先生的修辞学著作“望洋兴叹”,虽想整理,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忍痛割爱,留待将来了。

^① 《演说美辞法》的几个重要版本也都在上海发表。

总之,上述这些修辞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具有一定的紧迫性,我们先对它们加以整理,精心校勘,形成带有导读和注释的资料汇编。如果有机会能继续本研究,出版续编,我们很乐意继续整理那些稍普通一些、外埠出版的、规制更大的修辞学著述,以期完整保存文献,供学界了解和掌握中国近现代(清末及民国时期)修辞学教学乃至修辞学研究的全貌。

三、理论和应用价值

中国的修辞学史研究和修辞学原始文献的整理发展不平衡,必须重视对经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对清末、民国时期修辞学文献的整理是这个工作的起点,也是最核心的部分。

清末、民国时期的修辞学是个宝库,中外文化交汇和碰撞,激发出很多思想火花,对于当代的研究仍有启发。像汤振常在 100 多年前提出的很多问题(“修辞学教科书例题”,如“问言语不能表白思想情感,其弊害何在”“问出之口者为言语,不能适当则达之笔者,将何如”“问应用二字何解”“问技术与学问何别”等),有些到现在也不能很好回答。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这些文献发掘出来。

修辞学仍大有可为。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给修辞学的发展带来机遇。但修辞学的发展不能割断历史,必须要全面了解中国现代修辞学的产生、发展过程,要做到“守正创新”(北大袁毓林教授语)。修辞学要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需要 we 联系当代语言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更需要上溯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修辞学的源头,认真研究这门学问是如何建立的,一些重要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一些主要的修辞学理论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

与清末、民国修辞学研究传统的断裂,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当代修辞学缺乏保证学科持续发展的雄厚学术积累的滋养,从而渐渐走上了下坡路。如果我们能对清末民国时期的修辞学资料加以认真的整理和研究,就势必能提高我们对修辞学学科研究性质、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助于当代修辞学把握住新的发展机遇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对于语言应用研究及其他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是和清末民初兴起的教育改革密不可分的。废科举,兴学堂,引进和普及西学新知,直接催生了 1905 年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南洋中学堂)的出版。不少综合性语文教材也都有修辞的章节。如 1905

年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学占一半篇幅（第三卷、第四卷）；1912年戴克敦《国文典》（“师范讲习社师范讲义”）下编为“修词篇”，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一强。此后民国颁布新学制，加强国文课程，强调修辞教学（如1923年《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规定的课程内容包含“修辞学大意”；1929年《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包括了“文法与修辞、修辞的组织法、藻饰法和文体的分类等”），推动了大量穿插修辞学论述的国文教材的编纂，而这些教材又大多在上海出版发行。

对这些文献的整理，有助于深入探讨修辞学和语文教育的关系，帮助修辞学研究者根据修辞学教学中出现的难题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促进当代语文教育质量的提升，有较强的应用参考价值。

最后，草创时期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内容涉及文章学、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国现代化进程等诸多其他邻近学科及研究领域。本书的编纂也可供这些学科和学术领域的研究参考。

目录

- 1 ▶ **第一编 《演说美辞法》**
- 一 《演说美辞法》导读 / 3
 - 二 甲辰学报汇编提要：演说美辞法 / 17
 - 三 《演说美辞法》(1904)正文 / 18
 - 四 附复旦钞写本《演说美辞法》序、目次、第一章 / 32
 - 五 附《科学一斑》载《演说修辞法》(1907)弁言、第一章、第九章 / 34
- 39 ▶ **第二编 汤振常《修词学教科书》**
- 一 《修词学教科书》导读 / 41
 - 二 《修词学教科书》文本及注释 / 51
- 85 ▶ **第三编 龙志泽《文字发凡》修辞学二卷**
- 一 《文字发凡》导读 / 87
 - 二 《文字发凡》修辞学卷文本及注释 / 98
- 195 ▶ **第四编 唐钺《修辞格》**
- 一 《修辞格》导读 / 197
 - 二 《修辞格》正文及注释 / 210
- 253 ▶ **第五编 陈望道《修辞学》(油印本)节选**
- 一 《修辞学发凡》(油印本)导读 / 255

- 二 《修辞学》正文(节选)及注释 / 270

- 293 ▶ 第六编 胡怀琛《修辞的方法》
 - 一 《修辞的方法》导读 / 295
 - 二 《修辞的方法》正文及注释 / 306

- 335 ▶ 第七编 (附录)修辞学论文选辑(四篇)
 - 一 陆殿扬《修辞学与语体文》(外一篇) / 337
 - 二 云六《国语修辞法述概》 / 352
 - 三 何爵三《中国修辞学上的几个根本问题》 / 366

- 376 ▶ 后 记

第一编

《演说美辞法》

一 《演说美辞法》导读

一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开端

当代修辞学的研究不能完全和历史割裂。只有认真挖掘修辞学的历史遗产,才能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修辞学的学科属性的认识,将历史的研究和当代汉语修辞学的现实课题结合起来,改变“为写史而写史”的局面,对汉语修辞学的发展作出切切实实的贡献。

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应从何写起?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应以1905年为起点。如《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第四章“最早引进外国修辞学说的论著”说:“1905年在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可大书一笔,因为这一年同时有两本现代修辞学著作问世。于该年5月出版的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是最早的一本。”^①《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上卷)第二章“草创期的修辞理论”第二节“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的两本开创性著作”也说:“1905年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这一年迎来了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两本开创性著作: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和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卷》。”^②

《修词学教科书》和《文字发凡》的确极为重要,我们后面将分别重点介绍。但是,它们并不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起点。如果换一种视角,可以说,中国现代修辞学是以对演说学的探讨而拉开帷幕的。

按照西方修辞学的传统,修辞学本身就是说辨之学。可以说,西方修辞学萌芽于政治自由活跃的古希腊对演讲术的探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主要就是在讨论演讲的技巧,本身就是一本“演说学”著作。一定意义上,所谓的“演说学”几乎等同于“修辞学”。而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域,在过去的修辞学史研究中多被忽视。实际上,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出版前,中国确实早已有多部“演

^① 宗廷虎《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143页。

^② 宗廷虎《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该书还将现代修辞学史推前到1901年(1901年4月19日),因为蔡元培先生这天在杭州方言学社所作的《开学日演说词》中间提到一句“我国修辞之学”(详见该书第78、86页)。显然这个根据还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

说学”和“演讲学”著作行世。但遗憾的是,中国的修辞学史著作对演讲类著作中的修辞论述的总结太少了,几乎到了忽略的程度。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对于今天的修辞学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演说修辞是当代修辞学史应该弥补的一个研究盲区。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考察了清末民初国内演说修辞的研究。^① 我们看到,在日本近邻的影响下,演

说这种古老的传播形式在晚清特殊的政治气候下也迅速崛起。相应的,演说修辞学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功不可没。经过进一步的资料爬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1905年之前,中国现代修辞学已经开始了对演说修辞学的译介。1904年《北洋学报》发表的《演说美辞法》可称得上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中“最早引进外国修辞学说的论著”。虽然是一本译著,但无论是从论著的完整性、体系性,还是在对外来学术的消化和吸收方面,以及对当时及后世的社会影响上,它都有一定的开创性。说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从这本小书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图片 1-1 《北洋学报》发表的
《演说美辞法》

二 《北洋学报》版本主要内容介绍

《北洋学报》版本的《演说美辞法》为一卷。主要内容如书中所列目次:

大意第一 声音第二 态度第三 手仪第四 足式第五 容状第六
台戒第七 演法第八 纯熟第九 研究第十

该书首先阐明了演说的重要性,并说“急译一通,以告吾国之有志于修辞学者”,这就指明了演说和修辞学的关系。然后又简单介绍了古代雅典演说家狄

^① 霍四通《日本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与日中近代化进程》,《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1期。

摩西尼的生平事迹,以此传略作为序言。

第一章“大意”首先对演说学进行了界定,称其是“美妙其言语之法术也”;还论述了演说所应注意的“三事”,核心是要能准确地推测并判断听者的“意向”,并据此“自筹应机之法”,“定其可以达情之论旨及态度”。

第二章“声音”首分六情,即喜、怒、哀、乐、爱、恶六类,并按照各类的细目讨论发声之法。第三章“态度”也按照六情分别讨论相应的身体姿态要求。第四章“手仪”(正文作“手式”)、第五章“足式”则分别具体讨论了演说时手、脚的动作和姿态。第六章“容状”谈了“正其容状”,但亦可根据具体的情况“藉状达情”。第七章“台戒”笼统总结了登台演讲的九个应当避免的地方,包括心态、语言、身势等多个方面。第八章“演法”谈了警觉、感叹、问答、譬喻、叙列、引证和反复等七种表达技巧。第九章“纯熟”概述了威廉姆《辩才学》一书的主要要点。第十章“研究”篇幅颇长,主要是照录日本文部大臣井上毅关于教育方针的演说作为学习演说的范例。

该书第一句话指出,“是书为日本泽田诚武所著”。确实,通过泽田诚武编《演说美辞法》的目次可以看出其中的渊源关系。泽田诚武《演说美辞法:雄弁秘术》(青木嵩山堂 1887 年版)有 204 页,但论述部分并不长,只有 36 页,其余篇幅则是收录的九篇演说稿。具体目次为:

- 第一章 大意/1 丁
- 第二章 音聲ノ事/6 丁
- 第三章 態度ノ事/17 丁
- 第四章 手ノ作法/22 丁
- 第五章 足ノ踏方/23 丁
- 第六章 容儀ノ事/25 丁
- 第七章 登壇上ノ心得/26 丁
- 第八章 演説法/28 丁
- 第九章 演説ハ自然ト練磨トヲ要ス/32 丁
- 第十章 演説ヲ研究スルハ名家ノ演説筆記ヲ暗誦スルニアリ/36 丁
 - 欧洲土产 子爵 谷千城君演説/37 丁
 - 遠心力と求心力 伯爵 板垣退助君演説/50 丁
 - 宴會卓上演説 伯爵 後藤象治郎君演説/75 丁

- 社会の形勢學者の方向慶応義塾學生に告ぐ 福沢諭吉君演説/78 丁
 法と道との別 加藤弘之君演説/125 丁
 私は造物主あることを信す 中村正直君演説/142 丁
 明治法律學校に於て演説 箕作麟祥君演説/155 丁
 悲憤慷慨の説 理科大學教授 矢田部良吉君演説/170 丁
 國會法 文學士 高田早苗君演説/178 丁

其中并没有井上毅的演说。可见《北洋学报》的翻译依据并不是这个原本。

泽田诚武《演说美辞法：雄弁秘术》出版后很受欢迎，不断再版。1890年改正六版计199页，收录14篇演说稿，但还没有井上毅的演讲稿。到了1894年版（订补八版），篇幅更扩大到254页。和前七版比较，正文十章的目次、页码均一致，不同的是第十章所收13篇名家演说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 大會の席上 伯爵 板垣退助君演説/37 丁
 元勳諸公の責任 衆議院議員 星亨君演説/48 丁
 敢て内閣大臣に告ぐ 全 河野広中君演説/78 丁
 内政外交 國會記者 末広重恭君演説/106 丁
 教育の方針 文部大臣 井上毅君演説/130 丁
 孔聖は大政治家たり 子爵 谷干城君演説/140 丁
 疾病の保険法 元内務省衛生局長 後藤新平君演説/154 丁
 言語の性質 文學博士 末松謙澄君演説/180 丁
 朝鮮の話 衆議院議員 犬養毅君演説/193 丁
 天則と人則 文學博士 加藤弘之君演説/213 丁
 バンガン半島旅行記 陸軍歩兵中佐 福島安正君演説/219 丁
 五品大會の趣意 実業論者 前田正名君演説/238 丁
 免税論 經濟家 田口卯吉君演説/241 丁

其中包括井上毅的演说。可见中国流传的译本可能就是参照这一版本翻译的。

实际上，泽田诚武的《演说美辞法：雄弁秘术》并非原创，实际上是抄袭另一本更早的《演说金针》（思诚堂1881年版）。请看该书的目次：

- 第一章 演説ノ大意
 第二章 音聲ノ事